

#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美國與中共的關係

蔡 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壹、前言

自從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來，中共與美國的雙邊關係雖然也曾歷經波折起伏，彼此間曾經爲了某些特定的問題，如所謂的「臺灣問題」和中共的不良人權紀錄發生爭執，但是基本上雙方的關係是在穩定中繼續不斷的成長。雙方的關係在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一九七八年的「建交公報」和一九八二年的「八一七公報」等三個公報的規範之下，循序漸進的向前發展，彼此間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學術交流，甚至軍事方面的合作都有相當程度的進展。

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四日凌晨，中共政權在北平以流血屠殺的方式，鎮壓了由學生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引起了美國的強烈抗議，採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結果使得中共與美國的雙邊關係陷入建交十年來的最低潮。就目前看來，雙方的冷漠關係雖然不可能完全破裂，或驟然之間就此結束了它們彼此間十餘年來苦心經營、刻意維護的友好關係，但是似乎也不可能在短期內重修舊好，回復到當年那種友好合作的局面。「六四天安門事件」可以說是北平和華盛頓間雙邊關係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本文的目的是把重點置於美國對中共的政策方面，由這個角度，有系統的來檢討「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美國對中共關係的演變，希望能夠藉此歸納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

## 貳：「六四天安門事件」前美國與中共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間，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趁國會休會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宣佈將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正式與交往多年的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此事雖然引起部份美國國會議員的強烈不滿和抗議，立場一向親中華民國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甚至不惜對卡特總統

提出訴訟，指控卡特的不當決策有違憲之虞。但是外交承認確屬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的法定權限，美國人民雖然不贊成以犧牲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作為與中共改善關係的代價，但是卡特與中共建交的決定基本上也獲得相當程度美國政界、學界、以及民意的支持。在卡特造成了既成的事實，克服了國會的初期反對聲浪之後，北平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由一九七九年正式進入正常化和制度化的階段。

一九八〇年美國進行總統大選，雷根(Ronald Reagan)會對卡特的對華政策大肆抨擊，並且表示在其獲選之後，將嘗試與中華民國恢復正式官方關係，雷根的談話使得中共大感恐懼，美國的對華政策又再度成為民主、共和兩黨政爭的重大議題。雷根入主白宮之後，在現實的考慮，和中共的強烈抗議之下，他迅即改變初衷，澄清了和中共之間的「誤會」，弭平了與中共之間因「臺灣問題」所引起的爭議。一九八二年美國又與中共簽署了「八一七公報」，更進一步界定了華盛頓對臺北軍事銷售的上限，暫時解決了橫互在美國與中共關係間的主要「障礙」——「臺灣問題」。在雷根主政八年期間，美國朝野對所謂的「中國政策」逐漸形成共識，在一九八四及一九八八年的兩次大選之中，中國問題都未再成為總統競選的主要議題。

一九八八年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夕，由民主、共和兩黨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曾前往大陸訪問，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此一代表團時還曾表示：自從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十六年以來，雙方關係有了顯著的發展，共和黨的尼克森為雙方關係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而民主黨的卡特則為雙方正式建交作出了貢獻。趙紫陽並且表示，美國在選舉年派出兩黨代表團，這說明了美國兩黨對中共的友好態度是一致的，這也正是今後兩國發展關係的條件。①大選前夕，美國兩黨高級代表團的到訪，再加上趙紫陽的友好談話，已適度反映出雙方領導階層對維護雙方友好關係的重視，以及對雙方未來關係的期望。

一九八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十周年前夕，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和美國總統雷根曾互以函電表示祝賀，希望雙方的關係能在前述三個公報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李鵬強調，十年的歷史證明，儘管中（共）美雙方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有所不同，但只要雙方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關係就能不斷克服困難和障礙，健康的向前發展。②雷根則在賀函中指出，中（共）美關係在建交後的十年中，不斷發展並且日趨成熟，並為今後更加牢固的關係打下了基礎。③雷根及布希（時任美國副總統）於白宮接見中共駐美大使韓敘時亦指出，只要雙方繼續遵守雙方發表的三個聯合公報，華盛頓與北平間的關係就會更加緊密，從而為建立一個更安全、繁榮的世界做出貢獻。④

註①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一版。

註②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二版。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同註②。

一九八八年底，在美國大選進入緊鑼密鼓階段，當副總統布希與麻州州長杜凱吉斯 (Michael Dukakis) 正為競選總統職位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共領袖鄧小平甚至公然違反不應對他國內政 (競選活動) 表示意見的基本外交禮儀，對布希的競選活動公開表示支持之意，布希曾於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間在大陸擔任美國駐中共聯絡辦事處主任一職，與中共領袖建立了相當程度的私人友誼，也培養出了布希對中共的特殊情誼，鄧小平當時曾對到訪的美國國防部長卡路奇 (Frank Carlucci) 表示，他支持「老朋友」布希在總統大選中獲勝。<sup>⑤</sup>

布希在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於就任之前，曾致函親中共的美洲華僑日報，在這篇紀念中 (共) 美建交十周年紀念的專文裏，他回憶了當年在北平擔任美國駐中共聯絡辦事處主任的歲月，他對自己能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發揮貢獻感到光榮。他並且表示，「展望未來的十年，我預料各種轉變和過去十年所見到的一樣美好，因為成功能孕育成功，美中 (共) 重建友誼，實是一項劃時代的成功。」<sup>⑥</sup> 就此函內容而言，其間容或存有某種程度的空泛外交辭令，但可能在相當程度上也確實反映了布希本人對雙方未來關係的樂觀看法。

當然，可能影響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因素很多，我們可以從國際戰略、軍事、政治、經濟，甚至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來加以分析，但是布希於派駐中國大陸期間與中共領袖建立起相當程度的私人情誼，對中共產生了感情，恐怕也是個不爭的事實，布希本人也曾多次親口承認他對中共 (或中國人民) 的特殊情感。<sup>⑦</sup> 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布希在與中共打交道的時候，他會傾向於中共，或作出違反美國國家利益的不當決策，但是他對中共的特殊感情或認識顯然會對他的決策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因為純就理論上來說，一個人很難對其所熟識，而且具有感情的對象，採取激烈、極端的政策。事實上，部份美國學者專家和新聞媒體也認為布希對中國人民 (或中共領袖) 的感情和瞭解可能會對他的決策發生影響。<sup>⑧</sup>

一九八九年二月，當時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一個多月，就趕赴東京參加日皇裕仁喪禮之便，前往北平進行「工作訪問」，這個事實已足以表示他對中 (共) 美關係的極度重視，布希自己親口表示，「有些東西已超越象徵性意義，美中 (共) 關係在美國任何外交政策平衡當中都有很重要意義。」<sup>⑨</sup> 雖然就表面上說來，布希這次訪問只是個歷時大約四十小時的工作訪

註⑤ 明報 (香港)，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二版。

註⑥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二版。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請參閱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89, p. 32.

註⑨ 鐘報月刊 (香港)，一九八八年八月號，八十九頁。

問，但中共並未掉以輕心，所有中共最高領袖，包括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萬里這些人都曾出面與布希會晤，中共方面真可謂精銳盡出，雙方並就彼此間的關係和若干國際問題「坦率、友好的交換了看法。」

訪問結束返美前夕，布希曾於北平美國大使館舉行答謝晚宴，邀請中共方貴賓，大陸著名不滿份子方勵之夫婦亦在受邀之列，美方可能是想要藉此間接表示它對人權的重視，結果方氏夫婦遭中共安全人員阻擋，不得其門而入。美方是否觸及中共的痛腳（中共的不良人權紀錄），才會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美國是否違反外交禮節，邀請了地主國的不滿人士；華府駐北平大使館是否提出不當的建議邀請名單，使白宮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這些都仍有爭議之處，但是中共悍然以強硬的方式，阻止友邦元首的賓客出席晚宴，這已不只是違反國際禮儀，嚴重的話，甚至可能因此引起外交衝突。但是布希對此僅以表示「遺憾」的低調方式加以處理，最後終於不了了之。由美方的低調處理方式看來，美國確實無意因此「小事」而與中共發生齟齬，更別說是因此而損害了雙方這些年來所苦心經營的友好關係。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粗率的認定北平與華盛頓之間沒有其它的摩擦，就中共的立場而言，中（共）美關係至少存在著三個必須排除的重要障礙：第一就是所謂的「臺灣問題」，美國必須切實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第二則是雙方必須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彼此間在經濟、貿易、和科技方面的合作，美國不應該對中共的商品輸出、科技轉移施加太多的限制；第三是美國應當把握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加強雙方的磋商，增進彼此間的瞭解，求同存異。④由中共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的這段談話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中共和美國間的雙邊關係雖然友好，但是彼此間也仍有些原則性的歧見存在，只是這些歧見不致於在當時對雙邊的友好關係構成立即而明顯的太大威脅罷了。

其實如果進一步分析起來，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具體歧見還可以包括有：西藏問題、臺灣問題、人權問題、柬埔寨問題、中共向中東地區出售武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國（尤其是美國國會議員）動輒批評其不良人權紀錄、西藏問題、以及出售導彈給中東國家一事非常不滿。著名美國亞洲事務專家何漢理（Harry Harding）於香港美國總領事館內所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中曾經指出，由於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實施改革政策，導致東西方敵意的降低，冷戰的氣氛逐漸衰退，美蘇與中（共）蘇的關係都發生了變化，當年美國與中共因蘇聯因素而強化的戰略依存關係也因而減弱。⑤因此何漢理認為中（共）美關係在「六四事件」以前就已出現一些問題，「六四事件」只不過是使問題更進一步惡化罷了。

其實何漢理的看法只不過是一種不同的表達方式罷了，說起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就像人與人相處一樣，即使是在

註④ 見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七版。

註⑤ 文滙報及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十一版。

最友好的情況之下，雙方也可能會因為時間、空間、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而有不同的利益考慮，彼此之間仍然可能因此而發生爭執、摩擦、甚至衝突。前述國際戰略環境的改變以及中（共）美間具體的摩擦都可能對華府與北平間關係的親密程度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使雙邊關係蒙上一些陰影，但是顯然仍不足以使雙方的關係在驟然之間陷入谷底。由前述的各種跡象看來，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基本上是相當友善、良好的，再加上布希與中共的特殊淵源，和中共領袖的交情，華府與北平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在穩定中不斷的繼續成長，雙方領袖在慶祝建交十周年酒會上的祝賀之辭，以及對未來雙邊關係的樂觀看法，倒也並非全然無據。

「六四天安門事件」才是整個問題的關鍵，使得中共與美國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陷入雙方建交十年來的最低潮。由日後雙方領袖所發表的政策談話或聲明看來，事情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雙方關係惡化到這個程度，實在是北平和華盛頓都始料所不及，可能也都不是它們所願意看到的。

### 叁、「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逆轉

在六月三日深夜，四日凌晨的鎮壓行動發生之後，中共的暴行立刻引起世界各國的強烈反應，素來以反映美國民意、監督政府施政著稱的美國報紙，不論立場如何都對中共的鎮壓行動表示非常悲痛，並且強烈加以譴責，憤怒之情可謂溢於言表。各報紛紛發表專文，要求對中共的暴行加以制裁，強調只要中共繼續這種鎮壓行動，中共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就不可能恢復正常。所有的報紙都贊成美國對中共採取制裁行動，甚至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都對中共採取某種程度的制裁措施。

立場右傾的華盛頓時報主張，應讓中共為其暴行付出代價，它批評美國以雙重標準對待中共，委曲求全，但是美國所謂的「中國牌」和戰略利益的考慮經不起事實的分析。就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美國應該堅持自由、民主的原則，而不是短期的政治利益。⑭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指出，當蘇聯的改革遠景正日趨光明之際，中共的暴行實在令人痛心，美方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對中共政策目標是針對圍堵蘇聯，在當前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很難自圓其說，美國必須重新檢討其對中共的政策。⑮紐約時報也以社論的方式表示美國應該對中共進行節制、理性的制裁，因為這不但可以兼顧美國信守的原則，也能夠考慮到制裁的有效性，該報主張美國應以強硬的方式向中共表達美國人民的憤怒和不滿。⑯

註⑭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7, 1989, p. F1; June 16, 1989, p. F3; and June 22, 1989, p. F1.

註⑮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5, 1989, p. A10.

註⑯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89, p. A22, and June 27, 1989, p. A22.

布希總統本人亦於六月五日立刻下令對中共進行制裁，布希所宣佈的制裁措施包括：(1)停止對中共的所有武器出售，包括政府對政府，以及民間的商業出售在內；(2)停止美國與中共軍事人員的交換訪問；(3)關於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要求延長居留時間的申請，將優予考慮；(4)經由紅十字會，對在鎮壓行動中受傷的學生和民衆，提供醫藥及人道的援助；(5)在中國大陸的局勢未明朗化之前，繼續檢討美國與中共間的雙邊關係。⑤布希總統的選擇性制裁措施顯得節制、溫和，布希在用字遣詞方面也再三斟酌，一方面希望表達美國的不滿，羣衆的憤怒，另一方面又不願意破壞美國與中共十餘年來所苦心經營的雙邊關係。

直到中共開始大肆搜捕，並處決了部份參加示威的民運份子以後，布希總統才在六月二十日宣佈下令禁止美國高級官員與中共人員的互訪與接觸，並促請國際金融組織同意暫時停止給與中共新的貸款，結果使得美國商業部長莫斯巴克(Robert A. Mosbacher)七月間的大陸之行爲之中止。另外，亞洲開發銀行及世界銀行也都在美國及其他主要會員國的支持之下，同意暫時凍結中共的貸款申請案。

美國國會對中共暴行的反應就和行政部門的謹慎、保守作風大異其趣，許多國會議員分別發表強硬聲明，嚴辭譴責中共的殘酷暴行，他們並向參、衆兩院分別提出許多建議案，要求進一步制裁中共，迫使中共早日放棄其持續性的高壓迫害行動。參、衆兩院中與亞洲、或中共有關的小組，如人權小組、亞太小組，及外交委員會等都分別召開聽證會，以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六月六日，美國衆議院以四百零六票對零票通過決議案，支持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譴責中共暴行，支持布希總統的制裁措施，並且呼籲中共儘早結束戒嚴。同日，參議院也以一百票對零票通過另一項決議案，除對布希總統提出一系列的建議事項之外，還敦促布希應與盟國諮商，協調對中共採取國際制裁行動。

六月二十九日，衆議院再以四百一十八票對零票通過一項修正案，其中包括停止美國政府對大陸私人投資的保險，緊縮非軍事用途的核子交易，促使盟國達成對中共出售高科技的協議，以及停止對中共的軍事銷售等等，但其中規定凡「涉及國家安全」的事項可以例外。⑥七月十四日，參議院以八十一票對十票，通過類似法案，暫停美國政府對在中國大陸私人投資的擔保，停止拓展雙方貿易的聯繫，暫緩由中共的火箭發射美國的衛星，並且檢討是否繼續給予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但其中也規定凡與「國家利益」有關的領域可以出現例外，這兩項決議案都給雙方關係的改善留下了一線機會。

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於美國參衆兩院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十四日分別通過的這兩項決議案有非常強烈的反應，中共

註⑤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7, 1989, p. A21.

註⑥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一版。

「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於七月二十日約見美國駐中共大使李潔明，「對美國國會一再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和蓄意破壞中美關係的行爲表示極大的憤慨和提出強烈的抗議。」<sup>⑭</sup>中共形式上的政權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屬的人大外事委員會也對此發表立場強硬的聲明，譴責美國國會「肆意歪曲我國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毫無根據的污蔑和攻擊中國政府，……我們表示極大憤慨。」<sup>⑮</sup>

美國國會所通過的這些決議案確實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了美國人民的不滿情緒，但是外交政策的執行仍然有賴行政部門的充份配合，才能發揮實際的制裁效果。布希政府雖然也對中共的暴行極表不滿，也採取了前述的一些溫和、節制的有限制裁措施，但是基於主、客觀因素，和現實國家利益的考慮，布希爲了維持與中共的關係，不惜抗拒來自國會的壓力，不願對中共採取進一步的制裁。這裏必須強調的是布希此時仍然堅持不肯召回駐北平大使李潔明（James Liley），也不肯對中共實施全面的經濟制裁，或取消中共的貿易最惠國待遇，結果這就引起了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對制裁中共問題的爭執。

六月二十六日，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以「太平洋新夥伴關係：未來的架構」爲題，在著名的美國亞洲學會上發表演說，並爲布希對中共暴行的審慎反應加以辯護。他說，布希已經用最強烈的措詞譴責過中共的殘酷暴行，但是美國不能因爲對於中共暴行的深惡痛絕而忽略了必須促使中共改革的這個事實。他說：「過去二十年來苦心建立的美中（共）關係一旦瓦解，對我們和中國人民都沒有好處」，因此「我們在對挫折採取反應時，必須出之以能夠刺激進步而非扼殺進步的方式。」<sup>⑯</sup>

紐約時報在六月二十七日刊出了對布希總統的訪問談話，布希在訪問中表示，沒有什麼事情會改變他希望與中共維持關係的決定，如果不與中共維持關係，這將是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種非常不好的作法，因此他將抗拒國會的壓力，不對中共採取進一步的制裁行動。他說，中共就是因爲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維持關係的結果，才在經濟上採取了某種程度的開放，並讓人民享有更多的表達自由，所以他無意取消中共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也無意和其他國家一起對中共採取經濟制裁措施。<sup>⑰</sup>

雖然行政當局已經再三反覆表明態度，不贊成進一步對中共施加制裁，但是美國國會仍然繼續對中共（或美國行政當局？）施加壓力。參、衆兩院後來分別又在十一月十五日和十六日通過了一項包含在「國務院授權法案」內的對中共制裁措施

註⑭ 聯合報（臺北），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十版。

註⑮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四版。

註⑯ 青年日報（臺北），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三版。

註⑰ 同註⑯。



，其內容包括：(1)對美國在華投資不提供保險；(2)停止對中共放寬軍火管制清單，不核發鎮暴和警用裝備的出口許可證；(3)暫停向中共出口衛星；(4)停止核能設備的出口；(5)停止對中共的貿易援助。但是這個法案是以「國務院授權法案」的形式出現，授權白宮轄下的國務院加以執行，國務院仍然可以根據「國家利益」來決定是否實行制裁，或是予以取消，換而言之，其間仍為制裁行動及雙方關係的改善預留了彈性空間。<sup>②</sup>

同樣地，中共也再度對美國國會的這種不友好行動提出了強硬的抗議，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於十一月十九日再度約見美國大使李潔明，痛斥美國的霸權主義立場，並詢以美國「究竟要把中（共）美關係引向何方？」<sup>③</sup>劉華秋強調，凡在涉及國家主權、獨立、和尊嚴的問題上，中共是絕不含糊，從來沒有屈服在外國的壓力之下的。但是他也表示了中共願意和美國恢復及改善關係的願望，只是目前需要美國政府採取實際的行動，他並且說：「我們希望美國政府能……採取有效措，明確反對國會的這個議案。否則，由此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只能由美國政府承擔。」<sup>④</sup>隔日，中共人大會外事委員會也發表類似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國會通過制裁中共的修正案。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明確看出中共的基本立場，中共無意與美絕裂，但也不能容忍美國對其「內政」的干預，北平要求華盛頓採取主動，來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它並且要求美國行政當局來否決國會的不友善立法。美國國務院方面的反應是，行政部門瞭解中共的這種情緒，也一直反對國會以立法的方式來要求制裁，該院的一位發言人也承認，在國會所通過的這些法案中，有部份條款提供了一些運用的彈性，只要總統認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他就可以將某些制裁措施予以停止實施，但是美國也「希望中共能……採取步驟，使我們能把雙邊關係恢復正常。」<sup>⑤</sup>

就中共政權的體制而言，它固然也有政權和治權機關的分別，但在行政權獨大的情況之下，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名義上的國會（政權機構）一般只被視為橡皮圖章，沒有太大的作為能力，更別說是以立法的方式來制衡、監督政府，或要求行政當局確實執行立法的內容。也正因為認知上的不同，所以中共才會一再的對美國行政當局施加壓力，要求白宮否決國會的不友善立法。但是在美國的情形就截然不同，行政當局非但無法指揮與其平行的立法機構，有時甚至還得委曲求全，必須執行國會與行政單位立場完全相反的立法，當年的「臺灣關係法」就是個典型的例子，行政單位（白宮）與中共修好的願望並不一定能夠獲得立法單位（國會）的無條件的支持。

註②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二版。

註③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一版。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中央日報（臺北），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版。



雖然雙方政府都已表明願意改善關係的主觀願望，但是美國國會參、衆兩院却又在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分別通過了一個「一九八九年緊急放寬中國移民法案」，結果不但進一步引起了美國總統和國會的爭執，也爲已經相當不友好的北平和華盛頓的雙邊關係火上加油，使得雙方關係更形惡化。美國國會所通過的這個法案決定豁免所有持J-1交換學者（生）簽證的大陸留美學人，在完成學業後可以不受必須回國服務兩年才能再次返美改變簽證種類的限制，准許因爲擔心回國會遭受迫害的大陸留學生延長在美國居留四年。國會立法的目的是要保護大陸的留學生，以免他們在簽證到期被迫返回大陸後因曾支持海外民運而遭到中共的迫害。

北平當局對此立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中共除了透過「外交部」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之外，素來代表中共官方立場的人民日報也以評論員文章的方式痛斥美國國會中的某些人，「企圖透過經濟和政治制裁手段向中國施加壓力，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美關係」。<sup>②</sup>中共的瞭望週刊海外版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文章中指稱，美方在六四事件之後，「窩藏」方勵之夫婦（方氏夫婦在六四事件之後，因擔心遭中共當局逮捕，故避居美國駐北平大使館，受到美方的庇護），准許逃離大陸的中國民運份子如嚴家其、吾爾開希等人在美活動，再加上美國國會所通過的這個法案，在在顯示美國國內有一股反中共勢力，從未放棄在中國大陸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這個法案的通過是「惡化中美關係的又一嚴重步驟」。<sup>③</sup>中共再度要求美國政府要「言行一致」，立即採取行動，否決國會此一法案，否則，中共將不得不「作出強烈反應，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將由美國方面承擔。」<sup>④</sup>

十一月三十日，布希總統趁國會修會期間，在啓程前往馬爾他參加美蘇高峰會談之前，宣佈否決前述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布希表示他已採取行政措施，保護中共留美學生，所以不須此一法案，他也批評國會所通過的法案是干預外交政策決定的行動，侵犯了總統的權力。換而言之，布希雖然支持這個法案的精神，但是既然他已下達保護學生的行政命令，而此一法案又侵犯了總統的行政權限，所以他必須否決此一法案。<sup>⑤</sup>布希此一決定招致許多國會議員的不滿，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國會復會，其首要工作就是要推翻總統的否決，投票前夕布希還在努力爲其政策提出辯護，促請國會三思，希望國會切勿草率行事。他說：「該法案完全沒有必要，而且會帶來深遠的潛在影響。我想看到中國繼續前進，……我想保持聯絡，我不想

註②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版。

註③ 瞭望週刊（北京），四十八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四十六頁。

註④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版。

註⑤ 明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三版，及十二月四日，二版。

孤立中國。」<sup>②</sup>二十四日衆議院進行投票，結果以三百九十票對二十五票的懸殊比數，推翻了布希的否決，二十五日參院進行投票，結果以六十二比三十七，只因四票之差而未達三分之二多數，未能推翻布希的否決。

一月三十日，美國國會再度不顧美國及中共的反對，又重新通過了附在「國務院授權法案」上的修正案，要求行政當局在採取重大對中共政策之前（如一九八九年兩度秘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克羅前往中國大陸），必須先通知國會，國會仍然希望以立法的方式，繼續對中共加以制裁。中共也循例透過其「外交部」發表嚴正聲明，強烈斥責美國國會的霸權主義行徑，並向美國政府表示「極大憤慨，並提出強烈抗議」。<sup>③</sup>布希總統則在二月十六日簽署此一法案，但是因爲他認爲該法案侵犯了總統的外交權限，「法律指令的制裁，代表了對總統履行外交政策能力不智的限制」，所以他將漠視其中的部份內容。<sup>④</sup>

事實上，除了上面所敘述的中共與美國的主要爭執之外，下面的一些零星事實也足以說明中共和美國間的雙邊關係確實已經逆轉，雙方已不再具有以往那種友好、和善的氣氛。方勵之夫婦托庇於北平美國大使館，中共提出強烈抗議，北平干擾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廣播，驅逐美國記者，騷擾美國使館，中共軍隊並對使館區開槍射擊，美國也以抗議回應。布希的武器禁運命令，範圍廣泛，金額龐大，涉及三百多個項目，金額則超過二億美元以上。雙方的學術交流，以及由中共代爲發射美國製造的人造衛星的計畫也曾一度中斷。布希本人也曾以國家安全爲由，下令禁止中共購買美國飛機零件製造公司，並深入考慮是否再度給予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等等，這一切都可證實雙方關係的惡化。

由美國府會對制裁中共與否的爭執，和中美雙方政府立場強硬的談話或政策聲明，我們可以看出北平和華府之間的關係確實陷入了困境。以前中共與美國固然也曾多次發生爭執，關係轉趨冷淡，但那多係因爲外在因素，如「臺灣問題」所引起，而這一次則是因爲中共本身的內部因素使得雙方關係受到嚴重破壞，這個事實說明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對美國與中共關係傷害的嚴重性。但是這一年來也有其他跡象顯示，雙方除了在主觀意識上都有意維持彼此間關係之外，雙方——尤其是美國——還曾經採取了一些示好行動，希望改善彼此間已經嚴重受損的關係，（或者是至少無意使已經受損的關係更形惡化），但是由於各種客觀事實的限制，以及彼此仍然堅持基本立場，看來這個改善雙方關係的目標是否在短期內獲得實現還是個未知數。

註② 明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二版。

註③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一九九〇年二月三日，一版。

註④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八日，十二版。

## 肆、雙方的接觸和改善關係的努力

雖然雙方關係的嚴重受損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即使是在美國國會一片對中共實施強烈制裁的呼聲之中，我們發現美國與中共的某些合作關係並未因此而完全中斷，布希總統的部份禁令也未完全予以實施。據香港文匯報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引述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指出，美國在大陸設置負責收集蘇聯軍事情報的監聽站，其運行並未中斷。同月七日，美國國務院證實，在布希宣佈對中共實施軍事制裁之後，原先被禁止輸往大陸的四架波音七五七—二〇〇型飛機，已由國務卿貝克核准運交中共，布希總統也已批准此一決定。

七月三十日，趁柬埔寨問題在巴黎召開國際會議時，美國國務卿貝克與中共外長錢其琛數度會面，雙方均藉機表明欲維持友好關係的願望，但這已與布希禁止雙方高級官員接觸的禁令不合。十二月十九日，白宮又批准了出售人造衛星，由中共代為發射的方案，同時也取消了禁止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中共貿易融資業務的禁令，白宮在聲明中指出，此舉合乎美國「國家利益」。

繼前國務卿海格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初訪問中國大陸之後，被中共視為「中國友人」的美國前政界人物，如尼克森、季辛吉之流亦開始分頭前往大陸訪問。十月二十八日尼克森前往大陸進行為期六天的訪問，尼氏此行雖係私人身份，應中共之邀前往，且以「發掘事實真相」為名，但是由於尼氏此行實際上具有半官方親善大使的意味，為布希政府傳達訊息，提供政策參考意見，故其大陸之行頗引起外界的重視。

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曾與中共各級領袖如鄧小平、李鵬、楊尚昆、錢其琛等人舉行會談，雙方都藉此機會各自表明了本身的立場和看法。中共方面表示，中共與美國當前的外交困境既非北平所願見，也非中共所造成，中共衷心希望美國政府衡量得失，採取前瞻性作法，使雙方的關係早日恢復正常發展。中共堅持其一貫立場，認為美國不當介入大陸民運太深，中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美國應該採取主動，而且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才能恢復雙方的友好關係，換句話說，美國應為當前雙方關係的惡化負責，但是如果美國採取主動示好行動，中共亦將善意予以回應。

尼克森則表示，美國與中共對「天安門事件」存有「巨大而不可溝通」的歧見，他呼籲中共不要成為一股壓制和停滯的逆流，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確實已受嚴重損害，目前正處於「最嚴重的情況」，但是即使如此，中美雙方仍應共同努力，治療

註② 明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六版。

註③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一版。

創傷，改善關係，華府與北平應該拋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以戰略關係為重，他並且對雙方關係的恢復正常和成長，深具信心。<sup>②</sup>繼尼克森之後，另一位與中共關係友好的美國前政界人物季辛吉亦於十一月七日前往大陸訪問，行前他也曾強調，華府與北平應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恢復對話，他甚至引用中國諺語「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來形容雙方的關係。<sup>③</sup>

尼、季二人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他們二人一向親中共的觀點，尼克森於事後曾向白宮提出此次大陸之行的機密備忘錄，表明了他對「六四事件」後中（共）美關係的看法，和今後雙方關係改善的展望。布希總統後來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尼克森的大陸之行是有用和建設性的，而其所提簡報的內容也有助於他（布希）對中國大陸情形的進一步瞭解，但是布希也引述了中國的古老諺語，強調「解鈴還須繫鈴人」，而美國並不是繫鈴人。<sup>④</sup>換而言之，美國又把改善雙方關係的這個責任丟回給中共。

話雖如此，但是就現已公開的資料看來，美國所採取的主動示好行動遠多於中共方面所採取的行動，十二月九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及副國務卿伊戈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之下，突然出現在中國大陸，彼等大陸之行的表面理由是爲了美蘇馬爾他高峰會議對中共進行簡報，但實際上外界都把它視爲中（共）美雙方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美國方面立場軟化，首先採取了主動的第一步。白宮此舉立刻在美國國會內導致強大的抨擊，但是使事情更糟的是白宮後來承認，早在七月間布希就曾派遣史考克羅秘密訪問大陸，這已明顯違反了布希禁止雙方高級官員互訪的禁令。在面對美國國內的強大反對聲浪之下，布希政府仍然爲其行爲提出辯護，表示對中共的日漸開放深具信心。<sup>⑤</sup>

美國特使在北平期間曾與中共各級領袖舉行會談，已退休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接見布希特使時表示，「中美之間雖然有爭執及不同意見，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sup>⑥</sup>中共外長錢其琛則讚揚布希對中（共）美關係的重視，認爲美國特使此行有助於雙方增進瞭解，克服困難，使雙方關係早日得到恢復和發展。<sup>⑦</sup>據反映中共官方立場的「中國新聞社」十日發自北平的消息指出，中（共）美雙方對布希特使訪問結果均表滿意，雙方同稱願採措施，恢復發

註② 星島日報（香港）「尼克森的北京之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一版。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二版。

註⑤ 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臺北），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十版及七版，以及伊戈伯格在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的證詞。

註⑥ 明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二版。

註⑦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二版。

展雙方關係。<sup>④</sup>

後來伊戈伯格於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在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表示，他和史考克羅的兩次大陸之行，帶來了下列的成績：(1) 中共與美國恢復了傅爾布萊德學術交流計畫 (Fulbright Program)；(2) 「美國之音」可以重派記者駐在北平；(3) 中共表示不會對中東國家出售飛彈，並且否認北平會向敘利亞出售 M-19 型飛彈；(4) 中共在一月間宣佈解除北平戒嚴；(5) 一月間，中共宣佈釋放五百七十三名曾經參加六四民運的示威羣衆。<sup>⑤</sup> 由此看來，美國政府顯然認爲即使中共對美國善示意好行動的反應速度不夠明快，程度也不盡理想，但美國所採行的政策不但正確，而且確實也已產生正面效果。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中共宣佈北平解除戒嚴，美國政府立刻對此表示「歡迎」與欣慰，並認爲這是改善人權的「積極性」的一步。同時，美國政府也宣佈不反對國際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恢復對中共的「人道性」貸款，但美國仍然反對一般性的建設貸款。<sup>⑥</sup> 四月間，中共正式同意恢復自去年八月以來就已中斷的中（共）美學者交換計畫，只是將範圍縮小，不再派研究生前往美國。同月，中共同意恢復美國和平工作團赴大陸服務，五月間，布希總統不顧部份國會議員的反對聲浪，決定仍然同意給予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這些現象都說明了華盛頓與北平關係的惡化固然是個事實，但是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也並不是毫無緩和的跡象。

綜合而言，布希政府之所以堅持採取有限的制裁措施，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之下仍然願意和中共改善關係，作者個人認爲其原因基本上可以歸納爲：(1) 中國的領土廣大，人口又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世界政治舞臺，及地緣戰略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共的合作與否，對世界，或至少對亞洲地區的和平安定都有莫大的影響，中共的積極作爲能力或許有限，但消極的破壞，或阻擾能力總是有的。美國事實上也沒有辦法過份影響中共，過於嚴厲的制裁可能會使中共重返文革時期的孤立狀態，迫使中共走向封閉的排外政策，這將爲世界局勢的穩定、亞太地區的和平投下不安的陰影，且將嚴重損及美國與中共間得來不易的友好關係；(2) 美國擔心過份嚴厲的制裁行動可能會使中共像一九五〇年代一樣再度倒向蘇聯；(3) 中共可能會在外界的壓力之下，改變其目前的經濟改革及門戶開放政策，而這也將嚴重傷害美國的國家利益；(4) 對中共的制裁行動可能會把大陸廣大的潛在市場，拱手讓給日本及西歐國家，這並不合乎美國現階段的國家利益。也就是因爲這些現實因素的考慮，美國才會屢次採取主動對中共示好。

註④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一版。

註⑤ Hearin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February 7, 1990, Provided offered by USIA, Taipei, pp. 10-14.

註⑥ 聯合報（臺北），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一版。

## 伍、結 論

仔細分析起來，「六四事件」以後美國與中共的爭執焦點略可歸納為下面兩個根本性的問題：首先就是六四事件的本質和責任問題，中共認為這是一個打著民主、人權為幌子，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影響的「反革命叛亂活動」，事關中共政權的存亡絕續，這是中共的內政問題，在任何情況之下，中共都不容許外國干預，即使面臨外國的制裁或壓力，中共也絕不屈服。而美國方面則認為六四民運基本上是一個追求民主、人權的運動，示威羣衆或許犯了某些行動上的錯誤，部份訴求可能也超出了中共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這些都不足以為中共的暴行提供合理化的藉口，中共的屠殺行動嚴重違反了尊重人權的基本道德標準，當然應該受到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國雖然無意破壞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但是北平必須為其錯誤付出代價。

其次就是誰應該為中（共）美雙方關係的惡化負責，究竟是誰才應該採取主動，來改善彼此間的關係。由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共認為它自始就無意與華府發生衝突，北平自己才是整個事件的受害者，是美國的不當干預，以及制裁措施才破壞了雙方本來友好的關係，既然是美國應為雙方關係的惡化負責，所以自然也就應由華盛頓採取主動來改善彼此間的關係，中共可以採取相應的配合行動。但是美國方面則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雙方關係惡化的導火線，北平的暴行激怒了美國的民意和國會，美國政府所採取的有限制裁措施只是對中共暴行的一種合理反應，中共才是雙方關係惡化的始作俑者，當然應由北平負起改善雙方關係的責任。

由此看來，中共與美國雙方在認知方面顯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雙方關係的不能獲得改善，在主觀上雙方均有意與對方維持較友好的關係，在客觀上彼此也都有現實的考慮，必須漠視與對方在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方面的差異，而與對方保持來往。坦白的說，在現實的國際政治，或地緣政治的考慮之下，人權和道德的因素只有在能與國家利益相結合的時候，才有具體的政治意義，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當事國才會祭出人權、道德的美名來為其國家利益塗脂抹粉。如果人權和道德的考慮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而其代價又是相當沉重的時候，國家利益的現實考慮當然優於對抽象的道德、人權的支持，這些抽象的概念永遠無法和現實的國家利益相競爭，它們永遠只是居於從屬的、較次要的地位，是較不重要的考慮。這個基本事實說明了國際政治現實的一面，也解釋了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之下，北平與華盛頓的關係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至於美國和中共關係間的現實考慮究竟又有那些？除了前面所提過的一些原因之外，追根究柢的分析起來，我們認為美

airiti

國的對中共政策考慮基本上可以歸納爲三個層面：第一就是所謂戰略層次的考慮，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因素；其次則是經濟貿易方面的需求；第三，也就是最後一個層次才是人權、道德的考慮。用伊戈伯格的話來說，美國這幾十年來對中共的政策基本上可以分爲幾個考慮：首先，美國的目的在於尋求與中共建立一個戰略性的關係，在初期，美國把中共視爲抗衡蘇聯擴張主義的一股力量，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共的戰略性角色已擴及一般性國際事務；第二、美國一直鼓勵中共運用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以減低當地的緊張局勢，加強安定；第三、美國希望儘量使中共參加各種交流和活動，以促進北平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加強人權；第四則是尋求加強與中共的經濟和商業關係，以促進中共邁向市場導向經濟活動。④雖然表達方式稍有不同，前後順序也有差異，但是他的這一段談話已可完全把美國對中共政策的精髓表露無遺。

我們認爲只要華府不改變當前對北平的戰略構想，或仍然維持其基本的思維方向，只要美國仍然相信中共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的價值極爲重要，只要美國認爲它必須盡力維持這種關係，相信迫使中共重返孤立世界，或再度倒向蘇聯並不合乎美國的國家利益，那麼中共與美國就會維持一個最起碼的關係。就目前而言，雖然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不好，和雙方當年的友好關係比較起來，確實是有惡化的跡象，但只要整個大的國際環境沒有變化到會影響這種基本戰略構想的階段，美國與中共關係即使惡化，但也顯然會有個限度，絕不致於糟到不可收拾，或雙方斷絕外交關係的地步。畢竟他們彼此對對方的需要，和共同利益，還是遠超過他們彼此之間的歧見，現實的國家利益仍會克服當前的糾紛，只是他們是否會回復到當年那種友好的關係就又是另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了。

註④ 信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十一版。

\*

\*

\*